

第八章 建设新中国(1949-1965)

一、热忱的建设者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铭枢终于从国民党的压迫下抬起头来，从潜伏地下走向新的政治生活。所以，他欢欣鼓舞，给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了积极向上的界定：“我有三字偈：刹那刹那寂，为人涌热力，处事当机决。”满怀希望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不过，他这些佛家用语，同解放后全国普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不太吻合，1951年底作了修订：“真理作鹄的，主客观统一，为人涌热力，处事当机决。”他解释说：“其实佛家的寂字就是心与境（物）一致的意态，不是死的寂，乃是活的寂，所谓‘心境一如’是也。刹那刹那寂，也就是心境——主客观刻刻统一起来底意义。”^[1]以此来激励自己奋发向上，为国家建设努力工作。

中国共产党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解放后组织新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按照这一理论，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阶段，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当然，如何过渡，过渡期的长短等等，当时还在探索之中。然而，陈铭枢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路线，显然还不太熟悉，因而不太能适应新的政治生活，经常处于矛盾之中。

上海解放后，陈铭枢兴奋之余，深感自己应该在政治生活上有一番作为，就写作并印刷了《论国共再合作》的小册子，准备散发。他认为，国民党的民主派，“曾经单独执行中国革命任务的行动”，例如“一·二八的淞沪抗日战争和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所进行的民主革命”，因此，“国民党民主派无疑的，将要形成民主阵营中一个极重要的力量，它和作为中国民主革命主力的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也一定要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发挥特殊的巨大的作用”。他认为，过去国共的分裂，两党都是有责任的：“两党都脱离了它们自己所提出的革命目标，违反了它们自己所规定的政治经济路线。”在新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两党政治经济奋斗的目标的一致，证明今天国共的合作，不但在客观条件上有坚强的基础，就是在主观条件上也有牢固的根据”。他认为：“现在革命的领导，虽然是工农阶级，革命的先锋虽然是共产党”，“但是任何一个参加革命的阶级，仍旧应该保持他们本身的利益和立场，这些自由权利及政治地位，在友党方面，必须真诚地尊重与承认。”^[2]这说明他对如何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的问题，反对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还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这本小册子后来在朋友的劝告下没有散发。

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他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6月18日，他作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代表到达北京，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8月6日，上海各界代表会议开幕，陈铭枢是主席团成员。他在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发言，热情地说：“这次代表大会为代表上海600万人民意志的会议，讨论建设新上海的方针大计，大会的代表们，对党政当局

等首长，均很自然表现出衷心的信仰和拥护，这当然是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有精诚表现。这是我多年从政经验中没有见到过的。因之，不管目前如何困难，如何艰苦，但人民对政府有很大希望，抱有很大信心，这是个人对此次大会感到衷心愉快和安慰之处。”^[3]9月，新政协开幕，陈铭枢又作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于23日代表民联发言，对新政协筹备会起草的三个文件：人民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和共同纲领，表示衷心的赞成和拥护，最后陈述了民联的立场和愿望：“国民党自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以后，反对反动统治的运动即已开始，本会就是反对反动统治运动的国民党民主派同志的一个联合组织，在1945年成立于重庆。在旧政协时代，我们已经是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之一，一直坚决地站在人民方面，从事瓦解反动政权的工作。现在我们参加人民政协了，我们愿意承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从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同时我们坚信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应该与新民主主义汇流。一切假借旧三民主义为教条而反对新民主主义的人，都是孙中山的叛徒，必为全国人民所共弃而归于灭亡。我们号召一切革命的三民主义者都站在人民方面来，共同努力肃清反动残余，为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国家而努力。”^[4]政协讨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名单时，大会第一次印发的候选人名单上没有陈铭枢，陈伤感地痛哭。他说，他是福建人民政府的创始人之一，今天真正的人民政府出现了，没有他而感到灰心。后经他找中共中央的有关负责人谈话，才补上了他的政府委员职务。但陈与谭平山都没有作为民联代表兼任政协委员。

陈铭枢深感解放后共产党给自己指明了方向，使自己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真有说不尽的感激，常思粉身碎骨来报答党。但陈铭枢已年过60，作风和思维方式已经定型，又禀赋任性而倔强，自信而又不计较得失，率性而行的结果，常与时流不合拍。1950年间，陈铭枢三次上书毛泽东，讨论佛学，并在佛教界散发《与毛主席论佛学三上书》，大有用佛学治国的意味。毛泽东复信婉转地批评说：“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5]大约此后的一天，毛泽东召见陈铭枢，陈兴奋之余，和毛倾谈佛学，长谈一天。据陈铭枢后来对别人说，他认为，佛学非常高明，许多马列主义原理，如辩证法原理，佛学可以兼容。陈铭枢滔滔不绝，直到毛泽东另有事安排，他才起身告辞。新政协成立后，按照新中国的政治规划，国民党民主派着手建立统一组织，由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于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间，举行代表会议，统一成为一个组织，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和民促同时宣布结束。选举时陈铭枢虽得票最多，但协调不易，仅出任常委。陈铭枢系民革主席李济深的老部下，但从前几章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们两人之间历史上的积怨甚深，不易共事。陈铭枢的工作安排，就成为一个颇费脑筋的问题，除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职务外，久久未能落实。1950年9月，中央提名陈铭枢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他对出任地方政务，且是自己不熟悉的农林部，深感失落，觉得不能发挥作用，因而迟迟不愿赴任，宁愿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经毛泽东亲自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先了解一下地方情况

后，再回北京来。据李任夫听陈铭枢说，毛泽东曾两次到他家劝说，他才接受这一工作，高高兴兴到任去了，^[6]不久转任中南农林部长。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又担任中南抗美援朝总分会副主席。

陈铭枢在担任中南农林部长期间，中南地区和全国一样，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他在1951年所作：《两种制度两个结果——为中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纪念册而作》一文中说：“本区根据中央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对农业生产是以恢复粮棉生产为主，并有重点地恢复和发展特产，争取1952年恢复战前水平。1951年的任务是要在1950年丰收的基础上继续争取更高的丰收，迅速接近战前生产水平，棉花、烤烟的产量，则需超过战前水平。……”

“尽管在今年农业生产中，客观上存在着许多困难，而我们主观上也有些缺点，但终于克服了困难，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其主要环节在于什么呢？——就是爱国主义丰产运动的展开。”

“在这运动中，首先是结合了三大运动，在广大的农村中涌现了大批的劳动模范，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中，带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创造与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斗争方法，战胜了一切自然灾害。更主要的由于党政领导的重视，亲自动手，下乡检查，在重点去进行生产政策的宣传外，更着手细致的组织工作与技术指导，形成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组织与技术相结合，农民群众的个人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相结合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从广度深度来讲，都达到了最高的程度。”1951年底，他曾规划中南水产：“今年基本上完成——超过任务（40亿尾），比战前尚差10几万尾。1、52年方针任务：以恢复生产为主，重点放在淡水繁殖，提到45亿尾。最大问题为湖泊管理问题，如江西湖泊都在农民的手上。2、淡水养殖，利用水塘湖泊。江西渔民说：‘农民翻了身，渔民并未翻身。’故执行湖泊管理政策很重要。3、关于海洋渔业生产：经过民主改革运动，实行民主管理后，应当组织武装的渔民。”^[7]

1953年1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改组为中南行政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原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下所设各部在行政委员会成立后，一律改为局（处）。陈铭枢由中央任命为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为林彪，副主席为邓子恢、叶剑英、张云逸、程潜、张难先、李先念、李雪峰、陈铭枢）。5月间，陈铭枢上书中共中央中南局林彪等，反映自己发现的问题，他在信上说：“我在当前政治形势下……个问题，是本着一贯对党的……写出来的，特作供刍蕘……恳您们特予以察核。”（残件原样——引者）随信附上三件意见书，一是《机关与机关的反官僚主义》，一是《目前灾荒形势与领导的任务》，一是《从几句话联想到许多问题》。他在第一件里指出：“在旧社会里，机关是‘衙门’，其中工作的人就是‘老爷’。现在社会变了，旧思想还不能一下肃清，在旧思想层层包围的机关里，官僚主义很容易找到滋长它的温床。不管你自觉的或不自觉都容易走上这一条路。在官僚主义存在的地方，群众是不会起来的，更谈不到监督。因此，唯一希望上级党对机关的领导干部加紧进行思想教育，并不断检查和监督。”他在第二件里指出，中南地区当前灾荒严重，“逃荒、自杀、饿死等现象不断发生，并有集体请愿、偷盗、抢劫及杀卖耕牛、抢购粮食的严重事件发生。灾区干部的惊惶失措，农民群众的悲观失望，社会秩序不安，人心浮动。”虽然由于中央

和地方的努力已经缓解，但他认为还有艰苦的工作要做。他指出：“我区严重灾荒的形成，固然是以国民党遗留下来的贫困和自然灾害为其主要原因，而人为灾害也是主要因素，不容忽视。由于各级领导思想对农村工作的不够重视，以及干部在执行政策时的缺点和错误，都是人为灾害的主要根源。”他希望改变“轻农重工思想”，要求“严格制止加重农民负担、追求超额数字的邀功取宠行为，必须彻底贯彻中央对农村的政策，发扬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优良传统。”在第三件里，他根据中原大学几位民主党派学员听到的两位中共干部轻视辛亥革命、轻视民主人士的言论，他郑重指出：“今天的民主人士在政治上、精神上所迫切要求的，就是依靠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尤其迫切希望得到党的教育，若果使他们失掉了依靠党的希望和信心，他们就要象失掉了慈母一样的悲哀。”^[8]

不过，陈铭枢在中南时期的主要活动还是在党务和社会活动方面。1950年11月9日，在陈铭枢主持下，成立了民革武汉市分部筹备委员会，1953年11月12日，成立了第一届民革武汉市委员会，陈铭枢任主任委员。他通过接触政治的实际和参加群众各种运动，更认识任何正确的理论不能离开实践，才能真正掌握到社会发展的真谛。因此，在前述三字诀之外，又加上“永无厌倦念，常具惭愧心”两句话，来激励自己。

但是，陈铭枢从旧社会过来，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不大能适应解放后严格的阶级路线和组织纪律，又率性而行，是其是，而非其非。他的部下认为他脑子糊涂，也就是不懂得仔细观察、谨慎行事以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治倾向。首先，在筹组武汉民革期间有所谓“旧国民党归队”的错误思想，这同新民主主义时期，组织民主人士接受工人阶级领导、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是不符合的。不过，这一思想很快就纠正了。他在笔记本上写的《对新参加的同志的鼓励和应该努力的方向》中说：“1、在组织中的基本精神：在主观上必须向领导党看齐，在客观上人人都有入党（领导党）的希望。2、切不可存依赖、幻想的心理，要发挥作主人翁精神，要在工作中竞赛、作骨干、作典型。倘能如此，则将来由民主党派的阶梯进达领导党的条件，完全操诸自己，绝无侥幸可言。3、一切向领导党学习，因为民主党派缺乏严格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各成员的坏习性随时随地都易钻空子发作出来，很为可怕！领导党的成员反此，任何成员的坏习气，由党的教育可以渐渐克除。”

其次是在用人问题上。萧作霖历史复杂，中南统战部不同意萧任武汉民革委员，但陈坚持己见，统战部方面迁就了他。王之南原为十九路军干部，解放前参加民联，由陈铭枢介绍到革大学习，后经中央人事部调到中南农林部，任陈的秘书。陈铭枢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可能是由于王的人事档案在机关交接时，一时找不到，或因王的历史问题的疑问，组织上对王不能信任，但陈向来用人不疑，坚持用王任自己的秘书，甚至扬言，不当副主席也要用王。结果，中共方面虽然迁就了他，但按照组织纪律，许多保密文件和会议，因为这个秘书的关系，陈也就不能看到和参加。其他一些人事问题，也有不少分歧。

1951年底，武汉市民革出版《武汉民革》第1期，陈铭枢在文章中传述毛泽东讲话出现政治错误（《武汉民革》第1期未能找到，可能是关于福建人民政府问题），他瞠然不察。

有关方面发现后，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电令陈铭枢收回刊物，但刊物已经发出，无法收回。陈只好写信给朱蕴山、梅龚彬表示：“前为补救之计，作如下的建议：‘请中央将该内容错误之处指示明白，通令各地分会知道；二、令该错误文字的写作者另行检讨更正，载于下期同刊上，或载于民革汇刊上；三、倘该文字犯了严重的错误，则由中央严格指责通令各地方分会，或付以应得的惩戒。四、今后继续第2期以次的各种文稿，先寄中央常委会审核发还，然后登载，以免重蹈错误。’”

1953年间，陈铭枢和朱玉淑结婚后，陈铭枢的警卫员小郝是位责任心很强、警惕性很高的青年，对和朱来往的人员监视甚严，甚至不让她见客，拆阅朱的信件。朱深感压力，也引起了陈铭枢的不满。虽然，有关方面对警卫员的过分行爲，向陈作了道歉，但据陈说为了减轻夫人的精神压力，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对有关方面的“监督”行为进行了讽刺，出言不逊，并加以散发。这就构成了民革和中共的关系问题，而并不仅仅是一个警卫员工作中的错误问题。陈铭枢因此受到有关方面的严厉批评，不得不作出检讨。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梁漱溟作了“九天九地”的发言，对当时的农村政策提出意见，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梁表示不服，引起与会者群起声讨。陈铭枢是梁漱溟一起谈佛的老朋友，在批梁声中，陈冷静地作了发言，希望对这一事件有个实事求是的结果。据梁回忆：“他（指陈铭枢——引者）在会上提出，梁漱溟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呢，还是思想问题？他说，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而不必在此费舌耗时；如果是思想问题，那就另当别论，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渐省悟。他请求毛主席明确梁漱溟问题的性质……毛主席接过话头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这也是我提出保留他的政协委员资格的依据之一。但这个人的反动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9]陈铭枢的发言被认为是对梁漱溟作了掩护，是一个政治性错误，因而在会后也遭到批评，不能不作检查。

但是，陈铭枢起初对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还是缺乏了解，在当面批判梁漱溟时，仅仅就他和梁漱溟的关系问题作出澄清，他在《我对梁漱溟问题的第一次发言稿》中说：

梁漱溟是我的老友，今天对他犯着严重的思想问题——反动思想问题，我应有责任来对他加以检讨。

旧时代以讲儒家学说和杂以佛家之说著名的，现在京中我有两个老朋友，一位就是梁漱溟先生，另一位是熊十力先生。我十余年前在重庆屡向两位先生的友好和他们的弟子说过如下的话：“我对熊十力先生说情而不及理，对梁漱溟先生说理而不及政。”我始终坚持自己所标榜的原则，故能维持交情至今。（在座中也有个把朋友听过我说这句话）梁先生当能回忆，他将要加入民主同盟时，曾秘密征询我的意见，我问他，你答应了没有，他说答应了。我说答应了我尚有何说，倘未答应的话，我要劝你不加入，因为你决不是搞政治的人。你虽加入了政党活动，并参加了政协，但我对你仍保持一

向的原则，很少谈过政治。

陈铭枢的错误，引起民革中央的高度重视，民革中常委第100次会议议决，命陈铭枢对这一事件作出深刻的检讨。他的朋友于振瀛写信对他说：“中央对于这件事，认为个人思想检查提高是一事；民革在这一问题上应对社会有所交代，又是一事；克服个人思想障碍事小，影响社会事大。希望经过思想斗争的痛苦过程作好检讨，改造自己，教育全党同志。”^[10]陈铭枢很慨然地接受了作出检讨的要求，他在检讨书中承认：“在参加会议的群众都纷纷起来作敌对的斗争，毛主席和周总理又指出梁漱溟反动的伪君子的面目，而我不仅没有激起应有的愤激的感情，反而对梁发出掩护性的言论。这是我是非不分，敌我界限模糊，丧失立场的表现。”^[11]

他在1953年11月16日致于振瀛的复信中更坦然地表示：

总之，我的错误根源是：政治原则性和警惕性不强，实际斗争经验缺乏，故于仓卒中禁不得考验，致不自觉地露出狐狸尾巴来。（这与梁漱溟的尾巴有何分别！）这是我最深检讨出来的病根，千万望你再把此信转中央诸同志传阅，也可作为补充我的检讨书的附件。

至说到思想斗争痛苦过程一节，不瞒你说，我在三反以来已经历过了，到了现阶段，更加深自我的时刻反省、督责和主动地乐意接受任何同志的批评，严厉批评，绝不会对它有所抵触、抗拒，相反的很天真地表现出感谢和感激的心情。因为如此，所以我对此事自发觉错误之日起到现在，绝未波动过一丝一毫的情绪，反过来，很欣幸又得到一个大教训，促进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警惕性，时时刻刻注意着遇到任何事情，首先要提高到政治原则上来，坚定立场，走惯新路而不使旧的思想蠢贼再来钻空子。也因为如此，所以才能自动地写寄齐燕铭秘书长转交全国委员会的《我对梁漱溟问题的再认识》和寄给你各信及寄给邵老的信。振瀛老友，思想改造本来是一痛苦斗争过程，假如能够认识到垂死的旧思想必须消灭，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不容对它有丝毫损害，为了对自己负责，对革命负责，新生的必然会战胜垂死的，苟能突破这一关，那末，还有什么痛苦可言呢？你怕我痛苦一点，请不必过虑吧！^[12]

1954年夏，民革中央要求陈铭枢就历年所犯三项政治性错误作出检查，即：（一）对梁漱溟反动路线作了掩护性的发言问题；（二）对警卫员拆信等事件所持的态度问题；（三）在《武汉民革》创刊号上发表不正确的言论问题。陈当即表示完全接受，并着手深入发掘所犯错误的根源。但他因忙于武汉的防汛和防汛的慰问工作，接着又由中共和政府部门安排到庐山休假，仅写了一个简略的报告，准备到京时再行自我检讨并接受批评。不久又接到民革梅龚彬秘书长、朱蕴山部长、蒋光鼐常务委员联名给他的信，要他“从政治责任感上作客观的深入反省”，不仅“对我们民革要有一个严肃认真的交代，对领导党也是要作一个严肃认真的交代的”。于是，他又重作检讨，表示：

我过去自认为是最能依靠领导党并接受领导党的领导的了。其实我与领导党和劳动人民之间，在思想感情上还有很大的距离……犯错误原因：

（一）由于我具有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狂热性，在个人历史上曾与领导党许多领导同志有过较密切的深厚关系，解放后，毛主席又对我爱护备至，使我情不自禁的随时流露出对领导党的感激和爱戴。……自以为已与领导党的思想感情是完全一致的了，甚至不自量地认为自己已经是党外布尔什维克了。

（二）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自命不凡……标新立异……我在《武汉民革》创刊号上所犯对毛主席谈话加以曲解的错误，是这样产生的。……任性、急躁、轻于下结论，因之漠视群众意见，……脱离群众，脱离领导。……自由散漫，玩世不恭。^[13]

就因为这一系列的问题，民革中就有人反对他。他写信对别人说，有人“宣布我三个罪状：第一抗领导党，第二抗中央，第三抗群众；并批判我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思想。”他在中南军政委开会时，在大会上批评中南文化部副部长许凌青，民革内就有人批评他为好表现出风头。他在调京前，武汉民革同志对他作真诚的批评，经他自己承认说：“总病根是情心思想的体系”。具体来说，一是“对人热诚，直言无隐”，“漫不审察”。二是“自命不凡”的隐微，‘骄傲自满’的情绪，‘突出’的表现，‘进步’的包袱”。三是“感情冲动、封建情绪、片面论断、燥急冒进”。他表示要注意吸取教训：“非有关于人民利益，团结任务之争，慎勿轻出诸口。一刻不要忽略政治立场、革命利益的整个动向”。最后，他把自己的缺点归结为：“出言不谨慎，应言不虚心，粗，燥，空，疏，轻，忽，率。”^[14]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维方式。陈铭枢虽然多次受到批评，一而再、再而三地作自我批评和检讨，不断地反省自己，但他又对民主党派内的一些敷衍作风表示不满。他批评知识分子说：“‘非忠诚老实’既是知识分子的长期的根本的病源，此为今后思想改造之最中心的环节，我们首须认定这一着。……知识分子有他优良卓越的一面，不过要经过思想改造的实践后，才能化腐为奇，变恶劣为优越。”^[15]当时人的思维总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恍惚，他在1954年4月10日写的短语《廷甥谈话感作》中就中共反对“骄傲自满情绪”问题说：“我随口说道：在各民主党派方面，大部分尚未展开批评。至于它们的成员应批评的倒不在骄傲自满上面，恰在这反面面的‘自卑感’多些，不能说都没有骄傲自满情绪的，但总属于极少数罢了。我又说：‘自卑感’尚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不老实’。……（我）继续想去，翻然省察到这样观察大成问题。要知道，今天清楚看到：有了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前进，百分之百靠得住不会是错路。党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也是全世界各国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学说；党具有铁的纪律和使用无正不扶、无邪不摧（例如当前处置高饶叛党的事件）的批评武器；党教育指导日在刷新振奋生气勃勃向着无限美妙远景前进的全党党员；党的思想路线、政策方针通过以身作则的全体党员为全国人民的表率。在这种种转变了整个时代的气氛圈里，使民主党派人士只要接受领导跟着去走，不论你不自觉、半自觉或完全属于被动的也好，终不会和不能够停顿不进的。”^[16]一方面是理想和理论的绝对框架，一方面是种种复杂的社会现实。究竟什么是真理？常常会使人陷入不能自拔的混乱之中。这种思维方式直到文革之中，许多人在反省自己时仍是这样。

所以，陈铭枢尽管屡受批评，但他仍积极向上，努力多做一点事，而不愿甘居闲散，明哲保身。而这从另一角度看，也就可以看成有野心。事实上有时也确是难以截然分清的，因为人既想做事，也难免有私心，有私心即可被看成有野心。他曾于1951年冬写信给萧作霖表示自己的人生态度说：“至我受贬毁一节，我目前亦不欲置一辞，但我负责任的态度是一贯不懈的，绝不从受贬毁上着眼——除非我犯了政治上的错误或群众反映的真凭实据的批评……再者，您前次寄北京给我的信说我斗争性不强，此点您尚未能认识我，我今明白告您：我从十七岁加入同盟会至今四十余年，无日不在斗争之中，从未向恶劣腐化势力低头。蒋匪特务对我的危害毁坏之严重与长久固不待言了，乃至昔日彭泽湘利用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的关系盗窃为自家的政治资本，到了不遂他所欲的时候，唆使、收买杀人大王之王亚樵恐吓我，暗杀我，我亦恣然不为所动。”^[17]陈铭枢也确是这样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

二、直言遭祸

1954年底，大区一级行政机构撤消后，陈铭枢调中央工作。原指望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但最终未能实现。由于他历年的错误，民革方面在协商全国人民代表提名的时候，曾决定不提陈铭枢，但中共方面仍照顾他，让他作为广西省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8]只是没有担任人大或政府的职务。第二届政协于是年底召开，陈铭枢出任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虽然1956年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时，他得以补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但他对不能负责实际部门仍深感失落。他在从事社会活动时，排名又往往在蔡廷锴、陈劭先之后，也使他觉得难堪。他调中央后，中央统战部门召集有关民主人士开会，也很少邀请他，更难得听听他的意见。陈铭枢在民国时期，曾任广东省主席，代理行政院院长，交通部部长，抗日的十九路军本是他的部属，蔡廷锴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在国民党和红军战斗过的军政大员中，他是最早和共产党合作的人。他在民主党派中，也是比较早就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毕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现在，为了一首打油诗和为梁漱溟说了几句公道话，就受到那么多的批评，政治地位和工作得不到适当的安排，他也感到过分。这一切本是人之情，揭开了神圣的政界面纱，就不会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后来，这一切都被看成是野心的表现，当然是那个时代的偏见。

尽管如此，陈铭枢的思想是相当矛盾的。他一方面有所不满，另一方面，对中共感激图报，加以受着国家优厚的物质待遇，自愧有负于人民，更无以对党的知遇，故常思竭智尽忠，以图报答。因此，他不甘寂寞，总希望做一些具体工作。因为有中南农林部长的工作基础，他到中央后，仍希望在水产部门做点实事，也就是有当水产部长的“野心”。1955年间，他向有关方面了解有关渔业发展的政策方针的文件，以及北海市渔业情况的材料，深切体会到党和政府对渔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爱国增产运动的重视。因此，他以人大代表身份到广西北海视察渔业。在经过汉口时，到汉阳小军乡萧家湾参观渔业生产合作社，后又参观了长江边沌口镇的汉阳鱼苗养殖场。5月29日抵达南宁，6月

1日到达北海市，到基层考察渔业、渔港、水产加工业、盐业和农业生产状况，考察了渔业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并和基层骨干分子座谈。他虽然路过了故乡，挂念着故人，但顾不得他们的政治命运，而没有回乡，并于17日回到南宁。经过视察，他也发现了一些现实问题，他在报告中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基本是由于社员的思想水平赶不上组织形式，而另一原因，则是社员的技术水平也赶不上他们现在所掌握的生产工具——大船”，结果造成收入减少。^[19]

1955年冬，陈铭枢和钱昌照、张轸到山东视察。从济南到青岛视察渔业完毕后，陈铭枢接到邢西萍（徐冰）秘书长的电报，要他就近视察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具体的视察单位和谈话对象是由当地党政领导安排的。他在和青岛的许多大专院校的讲师、教授和机关、企业部门的一些科技专家座谈中，了解到肃反中一些人受到委屈，感到运动有偏差，并由此产生了对知识分子的同情心。他把发现的肃反中的问题，写入了自己的视察报告。同时，他由此也感到基层党员有骄傲自满情绪，在文教事业和知识分子政策中，存在着不符合党中央制定的政策的情况，因而开始注意知识分子问题。1956年他到青岛休假，和当地知识分子仍继续保持联系。一般说来，民主党派人士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经过群众革命运动的锻炼，不了解中共掌握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从大革命起，在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差距。陈铭枢不能理解和适应肃反中出现的大量问题，有很多意见和疑问，是很自然的。

1956年5月13日，陈铭枢从北京出发到西安，在陕西省委统战部、省人民委员会文化局安排下，进行为期两周的视察。陈铭枢自30年代任广东省主席并接办神州国光社以来，对文化事业一直很重视。这次视察，使他对陕西这一古文化地区和西安这一文化古城，在文化事业上的发展很受鼓舞，同时，对当前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也提出了许多批评。他在《视察陕西省、西安市文化工作报告》一文中，对基建工作中破坏文物的问题，认为是严重的，他指出：“如去年共清理了5000座墓葬，其中3000座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了。”对有关方面对于国画和古典文学的偏见，也都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如他批评说：“某些主持国画画展的部门，把一些老画家很有工力的山水画原件退还，并加以考语说：‘脱离现实’，或‘不是写实’。”他要求政府重视文化遗产人才的保护，指出：“主要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认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是否认识到人所受的自然限制。国家的文化、历史是永生的，而对于老一代人身内所富有的文化遗产，则是‘岁不我与’。我希望政府及早重视此事。”^[20]西安视察完毕后，陈铭枢希望在古典文学方面多做一点事，曾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意见，获得毛泽东的亲笔复信。

但在这两年里，陈铭枢因为过去所犯的错误，心有余悸，对问题的处理十分谨慎，不敢多所表现。1956年夏，中央统战部要他写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文章，因对自己的观点没有把握，所以始终未交卷，就是参加中共八大和学习八大文件的感想和心得稿，一再修改也没有送出。但他也并非明哲保身，而是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向中共方面贡献自己的建议。因为李雪峰在中南时与他共事，深得他的信任，他就经常通过李雪峰向中共中央

转述，并同李雪峰面谈过多次。有时也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以为直接从内部向中共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这样总可以少犯些错误。

1956年11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次外出视察。陈铭枢正在社会主义学院选学政治经济学，所以未参加京外视察，而准备在北京视察初级学校。他获悉北京市教育局已经布置好若干中学，等待代表、委员的来临。他深感这样视察难得真相，所以就采取了不公开的方式进行，即自行找了一些教师，用直接间接的方式分别谈话。他的这种调查方式后来是写入报告中的，因而并非是秘密串联。但是，他毕竟缺乏共产党人那种鲜明的阶级路线，找的人自然不是“根正苗红”的人，而是些非党知识分子。同时，陈铭枢也确实是通过石油学院的罗伟之等人，主要着重收集学校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向他们打保单，说清楚是直接向党中央反映的，叫他们不要保留，不要怕报复。这种调查方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被看成“抹黑”派，同所谓“歌德”派不同。陈铭枢通过视察，认为市教育局和某些学校，在执行党中央的教育政策方针上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为此，他没有按照常规，向人代会和政协报告视察结果，而是于1956年12月21日写了一份秘密报告，给李雪峰转达中共中央书记处。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反党的万言书。他在报告中主要反映了学校党团组织和非党知识分子的隔阂，反映了非党知识分子尤其是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的一些苦闷情绪。他指出，这是“许多党员同志未从内战时期的严酷对敌的思想解放出来，犹漫然施之于民主人士而带来的。凡属不能正确掌握三反、肃反的领导干部，本来存在着很深的对做过旧时代的官吏和任过教授的人士厌恶和瞧不起的心理——也可说是跟着仇恨反动政府而产生的，故对这一类的人士不屑深入去了解辨别，有一个运动来，动辄捕风捉影地一般都怀疑起来。”他认为，“每当一个政治运动在正面的伟大收获的同时发生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就是暗的（隐的）一面，酝酿的根芽。若未能预见于机先，必须随察于事后”。所以，他反映说：“我积了长久的岁月，默察了无数的具体情况，这种阴氛漫布归结为：年老一辈者世故更深，趋避愈巧，年青一辈者则竞相揣测，迎合意图，虽情隐未张，而风气已成而日弊，将见愤悻之志日窒，投机之形弥张，来日殷忧，莫大于此。”^[21]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话，真是忠心耿耿的肺腑之言。

1957年初，陈铭枢的朋友黄居素将去香港，建议进行广泛的对台湾的和平统一工作。陈极为赞成，即于5月5日面谒周恩来总理，进行汇报，得到周总理的批准。陈铭枢在和周恩来的谈话中，不仅谈了台港工作，也谈了对西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意见，同时，他向周恩来倾诉了自己胸中的苦闷，力陈自己不甘寂寞，要求发挥余热的愿望。他在《对周总理谈话提纲》中写道：

（一）当1954年全国人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张治中在民革组织传达，以冷嘲热讽的态度，暗指我不安分，有野心。（二）当时，我正严格要求自我改造时，曾虚心请教于与我有几十年革命交情，并同过患难的吴克坚同志，我指望他能对我作有效的帮助，那知他与我见面时，开口便列举高饶所犯罪恶，暗中来讽戒我。（三）湖北有一位起义将领（其实他是我的后辈），公然在群众中骂我为台湾反动集团中人。（四）

那次人大会议闭幕后，各省代表回去传达时，也多带下一笔，至今看起来仍是“莫须有”（野心）的罪名。（五）就连前年冬天“肃反”运动时，国务院某参事，仍当着我的朋友，肆口对我诋毁。自此以后，我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成了话柄，而在民革中央我所处的境遇更是恶劣万分（去年民革开代表大会时，统战部提我为十五个副主席之一，我因受了汉口某代表的启发，认为这样多的副主席，欲求团结，反而引起不团结的影响，故我毅然谢绝了）。即使我现在担任了副主席，我在民革也是失了作用的人。同时，我鉴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对我的态度（统战部关于民主党派的任何会议，我从未被邀请参加过），而民革内部形成这种局面那就不足怪了。总之，在两年多来，几乎无人敢与我交谈，几乎无了朋友，无了最知交的朋友。”（按：此据草稿，原文文字不太通顺——引者）

陈铭枢对统战部的意见，也曾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函中反映过，批评统战部喜欢“软熟”，疏远“生硬”，缺乏持正不阿作风。强调唯唯诺诺的风气必须扫除。这时，整风运动开始，中共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帮助中共整风。隔了两天，统战部通知，约他去开会，他很兴奋，认为是向最高领导讲了话才被邀的，故很积极，放下了谨慎心理的堤防，抱定主意要讲真心话。而且，陈铭枢秉赋率直，自信而又轻信，缺乏城府，自以为闽变时即和中共联合，背着进步历史的包袱，每以党的诤友自诩，对党外上层人士一贯瞧不起，认为他们都是把旧社会一套来逢迎党。而实际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对中共的历史和历次路线斗争只有一知半解，尤其不懂得阶级路线的重要性，他的自以为是的诤言就很难和当时中共对形势的判断相符。

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大家发言踊跃，陈铭枢听了别人的讲话后，好表现自己的思想又冒出来了，讲什么呢？他想到前几天在社会主义学院听到章伯钧在民盟传达关于毛主席对学校中党委制的意见，又从报上看到有人曾提议撤消学校中的党委制，所以，他依据自己视察高校的经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前学校的领导方面，多半是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值得研究。他认为今后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他谨慎地表示，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他接着补充说，机关中的党组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党组今后仍然应该存在。他在发言中提倡党员要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这段话，在《人民日报》5月9日的报道中没有提到。在第二次座谈会上，他对《人民日报》没有把他讲的话登出来表示不满，统战部长李维汉当即说，欢迎你写文章，批评得越尖锐越好。于是他就严肃认真地特意写了《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一文，交《人民日报》于5月12日发表。他的总的倾向，就是希望中共能更好地信任党外人士，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发挥自己作用的机会。5月16日，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听到有人认为“只提缺点，怕影响干部情绪”的话，又表示不同意见。他向来不习惯听单纯的赞美之词，而没有建设性的建议，又值中共号召整风期间，本是提意见的时候，所以，他说：“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

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5月17日，《人民日报》以陈铭枢说：“只提缺点不提优点才符合整风精神”的黑体小标题，刊登了他的发言。

在当时鸣放的气氛高涨的形势下，陈铭枢又听到传达毛泽东自己表示明年大选将辞去主席职务，并有“好大喜功”的自我批评，使他大为兴奋，对毛泽东十分钦佩，决意效法古人，上书诤谏。5月18日，陈铭枢上书毛泽东，对毛泽东个人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毛泽东“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他批评毛泽东所接触的党外人士，“仍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人。”他认为毛泽东确有“好大喜功”的缺点，希望他“深入体察，以求究竟”。他批评毛泽东“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同样，有时候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淆乱黑白，投其所好。”“有时候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过分鄙夷旧的……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尊重之处”，等等。陈铭枢对毛泽东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政治含义，作了完全错误的理解，以为毛是要从权力顶峰上引退，因而大为赞叹，希望毛泽东将国家大事托付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之后，“暂息仔肩”，深入群众，体察民情，提高修养，“为再度重任国家冲要的准备”。^[22]诚然，陈铭枢对新中国的政权运转方式有错误的理解，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同盟者，需要有一个学习和认识的过程。但陈铭枢对毛泽东的批评和建议，经过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痛苦经历的人，再回过头来看看，显然是善意而又中肯的，而且，难能可贵，也是如他自己所说的“犯颜敢谏”。不过，陈铭枢在上毛泽东书中，并没有象他自己所主张的那样，只提缺点，不提优点，而是充分地赞扬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强调解放后已呈“一片祥和气象，蔚然盛世”，“非特具慧眼与大魄力，曷克臻此。”

这时，原定于6月初召开的人大会议延期。所以，陈铭枢在统战部座谈会第一阶段结束后，趁人代开会还有一段空隙时期，决定到上海视察出版社情况，希望能对主管部门有所建议。在先，陈铭枢在面谒周恩来总理报告关于对台湾工作问题之后，受何公敢之托，请周恩来帮助何所编词典的出版。当时，学者著作出版困难，何有成立知识分子出版合作社的建议。陈由此了解到当前出版事业中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在统战部座谈会上也听到几位朋友谈出版社的问题，同时又在报上见着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引起他对出版事业的关注。他在动身前曾向民革李济深主席请假，并向人民代表大会张苏主任报告，他怕人事应酬影响视察，希望“暂不公开”。他于5月21日到上海视察出版社，同时进行对台工作。他虽然滞留到6月12日才回北京，但在上海并无重大活动。

正在这时，反右派运动开始。6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点名批判陈铭枢所说的“光说缺点，不说优点，这才合乎整风精神”。6月11日社论又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存在”的问题。陈铭枢看到后很是生气，认为简直是开玩笑，不讲信用，但也敏感到中共已不认他为朋友了。6月14日回到北京后，

他就向毛泽东写信进行申诉，希望得到谅解和宽容。开始反右时，他虽然紧张，但又以为自己在统战部的发言，不过是捋拾别人发表过的话，或对自己不至于有什么严重问题。6月2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在人大会议上，反右斗争被作为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这时，陈铭枢的历史首先受到批判，他给李雪峰的报告，在民革小组会议上也被作为反党罪行批判，他才觉得情况严重。7月14日，他向大会递交了发言稿，承认“我一生的历史都是丑恶的”，“我是一个狂妄自大的野心家”，“我是一个具有反动的、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并要求撤消自己的人民代表资格和国家一切职务，“彻底改造，重新做人”。^[23]然而，更严重的风暴接踵而来。就在这一天，民革中央小组举行扩大会议，由吴茂荪把陈铭枢上毛泽东书向会议作了介绍，指责陈铭枢公然污蔑毛主席。好象晴天霹雳，震在头上，使陈铭枢惊惶失措。自这以后，他非常痛苦，悔恨自己孟浪、荒唐，不该多事，几乎失去了生存的勇气，因而又想重新参禅研经，做个清白安分的老人，连理发也不敢出门。第二天，陈铭枢即在人大第四次大会上发言作检讨。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七月十四日为我人生绝大转变关键，不可不贺也，作五绝两首志之：否定吾全部，还看貉一邱，唯它消灭去，共产始抬头。诗成后重温整风——反右的伟大意义，方知毛泽东主席真圣人也。”^[24]他没有料到，给党写的不公开的报告和个人的批评建议会成为反党的罪行，在情绪激动之下，他把给李雪峰的报告和上毛泽东书的底稿都烧掉了。

10月23-25日之间，民革方面对陈铭枢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批判，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根据当时的政策，对他这个“右派分子”仍进行了“宽大”处理，撤消其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保留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撤消其民革中常委兼理论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保留民革中央委员职务。行政级别和薪水由3级降至9级。他从此闭门思过，出门也自动不坐小汽车，过起“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日子来。他有一首诗写道：

薄若伪相蒙，
真朋若个逢；
悲肠酒不解，
热泪落杯中。^[25]

在此期间，陈铭枢仍于7月初起，坚持写日记，在11月半以前，主要是摘抄佛家大乘经文、偈和作偈为主。11月半以后以写作古体、近体韵诗为主。以此来缓解自己的苦闷心绪，修身养性。

三、求实反省

人的一生是复杂的，一个人的人格也是复杂的。一个人在顺利的时候，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弱点，只有在挫折中进行反省，才能更冷静地看到自我。在政治压力之下，陈铭枢当然不能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但历次运动中受伤害的人，本无敌对意识，而是非之间，

也有许多复杂的情况，不易分辨。当时，毛泽东正如日中天，对毛的错误一时间也不容易正视。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受伤害的人，宁愿反省自己，而不能坚持真理，更有甚者，在是非之间，连自己也糊涂了，因为自己也确实有弱点和错误，也就把自己坚持的正确意见真的反省为谬论。这是一个时代的曲折。陈铭枢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之后，就有着相似的境地，他更多地反省自己的人格弱点，批判自己。但是，他的批判在基本事实面前，仍然是求实的，而不是虚谬的。

陈铭枢在问题交代、思想检查中，仍然坚持：“我的右派言论自始至终都是赤裸裸直接向党招供的，除了直接向党招供而外，我没有任何别的行为。”“从具体活动找反党集团那是困难的，因为并无这回事。”他只是这样承认说：“然而我的历史，特别是在民革组织范围内，各方面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我认识到，这些都是我的包袱，是我反党罪恶的根源。如果说我是有纲领、有组织的话，那末，我的思想意识就是一部活的反动纲领，而我那些千丝万缕的复杂的人事关系，也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我的组织了。”对于所谓写反诗的问题，他始终不承认。当时并曾写信给人大副委员长彭真，进行申辩：

这首诗是和上海一位朋友的原韵，他的原诗有不健康之处，故和诗一首，勉其努力工作。这诗我是写成条幅交吴艺五（民革）转去，曾说他的诗见不得人，并没有说过我的诗见不得人，如果是真的话，怎么能够写成条幅（是公开悬挂的）送人呢？

诗的解释：

“君诗忧患积，一语九回肠”（说明他的诗的心情）。“痛定宁思痛”（劝他不要因个人得失而介意），“群张已共张”（人民已当家作主，自己也有二分。上联两痛字与两张字，为诗法中的交错对法，将第一张字易作弦，不知是何用意）。“赤标天下鹄”（赤为共产主义，标为天下共向的鹄的——一作目的），“青换艰中桑”（象征新时代的春天，青葱景色换成了大地的桑田，已呈现在我们的眼中，把“青天白日”来附会青字，真是匪夷所思）。“莫负苍生愿，相将造乐康”（两句意义明显，不解释）。

此致

敬礼

陈铭枢

八月七日^[26]

他在承认自己是“右派”之后，仍坚持“在同志们的揭露中，如在淞沪抗战前打电报与蒋光鼐，从洛阳坐飞机回上海散发撤退宣言，同汪精卫、蒋介石勾结出卖孙科，以及出卖福建人民政府等，都不是事实”。他在检讨中说：“在人大广西小组上，因得到张云逸、韦国清等同志的耐心帮助（他们说，你不能单从你的主观愿望来着想，而要从客观上所发生的作用来着想），使我逐渐认识了我的错误。”这是流行的帮助委曲过关的办法，以避免因僵持而遭到更严厉的处分。

当然，陈铭枢也有真诚的反省，他检查自己说：“我背有不应有的进步包袱，总认为自己与领导党的关系久，交情深，爱党之心比别人切，俨然以领导党的诤友、益友自命。

加以狂妄自大、自鸣清高，在私人来往间政治上没有任何‘同调’的人。于是，主观臆测，擅作主张，因而形成了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欲望和野心。在政治上如此，在学术上也复如此。”他承认：“《上毛主席书》因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传达而引起的。我在大鸣大放中日益增长着对党的某些措施，特别是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怀疑。”“我受了苏共二十大个人崇拜的影响，我心目中的毛主席不知高出斯大林多少倍，故听了毛主席将于下届人大辞去主席的话，觉得毛主席有卓见，对他批评自己好大喜功的话，更佩服他的风格高尚。我认为毛主席除了精通马列主义外，又有中国的历史学识和中国儒家特有的伦理观念。假如我当时没有这种思想作基础，纵使我再反动十倍，也不会这样肆无忌惮。那时，我正在读资治通鉴，受他的影响也大，因此不自觉地视毛主席为汉文帝，而以自己的言行，自比于汲黯之戆。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获得毛主席的青睐——希荣猎宠，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也表现了我的不安分和政治野心。我同意毛主席对自己的批评，好大喜功，除了有迎合毛主席的想法外，并因听了农村合作化冒进了的谬论，从而产生了对合作化的怀疑，又有偏听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的说法，都是我对毛主席的误解。我说毛主席容易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听毛主席讲话，把李立三同志和陈独秀并提了两次……心里为他伤，也是因为自己在政治上屡犯错误，自以为没有得到党的谅解而自伤。”他在回顾过去时，也检讨自己，在梁漱溟和警卫员问题上作检讨后，“总认为党对我太过火了。党内（应为民革党内——引者）同志曾以政治野心暗规过我，我听了不顺耳，反而与他疏远了。”“发表我为人大常委时，不感到怎样满足，总以为常委是空的，没有什么可表现的，想搞实际部门，可以显显名堂。”

陈铭枢对自己的品格弱点，虽因环境而不免夸张，但确是以事实为依据地反省说：“我的主要毛病之一：我从来受人吹捧惯了的，又不知天高地厚，妄自尊大，自以为了不起，这是我的主要毛病之一。同时，我认识到，我得意不得，一得意，总要出毛病，乃至犯严重的政治错误。我的主要毛病之二：我生平冲动性和封建情绪，每每表现出很可怕的程度，只要意气相投，便漫无审择，善目扬眉向对方倾心腹，故最易受坏人利用。我的主要毛病之三：我喜欢夸夸其谈，并自吹自捧，好象羊吃草一样，见草便吃，衔着不放。”为此，他作诗道：“过去罪大恶极，从今安分清白；唯讷治吾夸张，落后原归本色。”此外，他还反省他自己特有的品性说：“我的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不切实际的作风，与乎对于人生所持的游戏态度（误用了‘菩萨游戏世间度人无量’的教理），简直到了愚蠢而又极端的狂且妄的程度（幸而我的政治野心常为‘常惭愧’的菩萨行和四无量中‘舍’的教义所涤除）。”^[27]

在1958年间，陈铭枢参加了民革整风小组和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打破了闭户自修的局面，又开始在人际交往中生活，并且参加一些义务劳动，改变了他许久不敢见人和人人不理睬他的孤独环境，抑郁情绪也随之而逐渐开朗。在当时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他还得以在北京参观各项工程达半个月，并到河北的徐水、安国，河南的郑州、洛阳等地参观。日常生活中，他以练习书法、绘画来充实自己的晚景，“安分、清白、服老”。当然，

他还是右派，所以，还要继续反省、改造自己，甚至充当反面教员。但据说，他依然改不掉直言的毛病，曾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后果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28]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讲话时还点到陈铭枢：“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29]毛泽东提到的陈铭枢的四句话，大概不是陈铭枢的原话，而是毛泽东自己的概括，但当时尚未反右倾（即反彭德怀），对右派也无进一步降罪之意，提到陈铭枢也只是作为参照系，暗示党内。但不久，彭德怀上书之后，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晴天霹雳，就降到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头上了。

1960年，大跃进由于反右倾而后果更为严重，经济形势紧张，政治形势则相反有所松动。这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于9月间出版，陈铭枢在学习毛选后，重新回忆和反省了对毛泽东上书的经过。这是一个比较冷静而如实的回忆，他说：“我在民革听了张治中的传达报告，知道毛主席将不再担任国家元首职务，张并于第二次报告又说，毛主席这种表示，甚为坚决。当我听了以后，我的思想相当混乱，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物，从没有自动辞职的先例，现在毛主席提出这种要求，实在是一个创举，故内心对毛主席这一非常行为，感到佩服，认为毛主席比斯大林伟大，这是我当时的思想真实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认为毛主席领导革命甚久，从胜利走向胜利，盛名之下，‘个人崇拜’总属难免，故对毛主席此举，甚表赞同；第三，由于我的封建思想和所受的儒家学说的影响（当时我正在读资治通鉴），故以毛主席比于封建皇帝汉文帝，而以汲黯自居，故采取‘上书’这一方式，以博‘敢谏’之名；第四，多年来我于世界史，熟悉俾士麦、伊藤博文下台后再上台的史实，常称赞为是历史人物的卓越做法，认为也可效法，且这样做对毛主席将更有利；第五，我平素对毛主席的看法，确杂有某种程度的谬见，以为毛主席在个人修养上，还不够理想，希望毛主席做一个我想象中的‘古今完人’；第六，在当时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是由右派掀起的），我认为与毛主席的个人修养，不无联系，故狂妄地公然向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的谬论。同时，还认为毛主席对于自己的一片‘愚忠’，定能嘉许，纵使有某些措辞不当之处，也无关宏旨。”^[30]此后，陈铭枢所处的环境有所改善。

四、安详的晚年

陈铭枢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度过了一段心境恶劣的时间。但他对佛学深有研究，在人生态度上，能够克制自己，不久就平静下来。他一方面钻研佛学，曾钻研《大智度论》100卷，一方面给夫人讲解佛学故事，一天讲一段。在政治局面松动之后，他还和远在广东饶平的张竞生通信往还，讨论佛学。虽然未能发表文章，却是一种自我修养。可惜，这些文献在文革中散失。

同时，陈铭枢继续深研书法，又兼学绘画。他在重庆时期，曾在章士钊（行严）鼓励下学习汉隶，初临《石门颂》。到了晚年，又重新以书法养身，临摩了10种以上的篆、隶、行、草（章草），装订成册，拿去向章士钊请教，得到章的指点。他又开始倾心写兰，画有《贞刚三友画册》，每成一帧，辄被友好攫去。他之写兰，或许别有心肠吧。兰花是洁身自好的象征，可以明志。他在1962年4月写的序文中说：“贞刚者，尚友柴桑‘贞刚自有质，金石亦非坚’之意。三友者，第一词，第二书，第三画也。”^[31]兰花又象征友谊，“真朋若个逢”，他在寂寞中呼唤友声吧。他当时既已不能谈论政治，就同朋友们谈论书画。有时还到民革北京市委作书法示范。陈铭枢本来身体强健，他在1957年和周恩来谈话时，就曾表示自己“生命力还很强，体力与一般七十老翁大有区别”。1963年1月1日，政协主席周恩来举行“百老庆会”，即70岁以上老人在政协礼堂会餐，陈铭枢也得以与会，周恩来鼓励老先生们“人生望百”，陈铭枢受到启发，又学习了一套动静结合的气功，持之以恒，使精力更加充沛。

陈铭枢被划为右派后，经常不坐小汽车，径自坐公共汽车进城，浏览东安市场、琉璃厂等古籍、书画、文物商店，选购自己需要的物品。有时，也到原先的皇家园林漫步。在这种场合，他依然在观察人生和社会。

尽管陈铭枢被划为右派，但他依然鼓励子女们好学上进。他在子女们面前从不抱怨，总是鼓励他们好好工作，为国家服务，做一番事业。他要子女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学习雷锋，为社会公益事业多做贡献。三年生活困难时期，大家糊口都不易，但当朋友们有求于他的时候，仍一如往常，尽力接济钱粮衣物。有一次，老朋友们在家中聚谈，到了中午时分，无以享客，他就和朋友们一起把家养的兔子拎出去到市场上卖了，到饭馆饱餐一顿，改善生活。

1961年夏，在松动的政治气氛中，全国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前往内蒙古海拉尔避暑，同行的右派有章伯钧、龙云等人，气氛比较轻松。有诗记其心情：

七 律

市中欢唱

（在海拉尔休暑）

一片天机任物情，亲亲都属陌生人；
饱更苦尽甘来味，始获涛崩浪覆珍。
折股以还忧患息，新生宁晚是非明；
东风浩浩苏群庶，环宇欢同一室春。^[32]

1962年4月间，政治气氛趋于宽松，陈铭枢的右派帽子得以摘掉，但这种宽松是既有限又短暂。或许陈铭枢是有所感觉的，是年冬，他与二位朋友聚谈，由于人亡物故，内容难以详考，他留有七律一首志之，诗意也晦涩不易解，仅录此以求高明：

七 律

壬寅冬杪，同建勋、德尊共话于三不老楼中，收拾世艰，全超物外，夙缘宏愿，宛然在目。唯觉我是梵天坠下之人，今日忝为二子长，尤赖匡襄同了此事，因是不可记也。乃作此律以覘异日：

虎溪桥上忆风流，不老楼中三共酬；
肯挂荣枯得失话，染污定慧慈忍修。
梵天坠落几番劫，尘网撕残又结俦；
互仗钳锤完夙愿，无边海会共优游。^[33]

1963年10月底，陈铭枢参加人大、政协视察组赴四川视察，写有详细的视察笔记。11月初，自重庆坐船东下，5日过涪陵，写下了绝句3首，表达了他的人生观：

5日舟抵涪陵时，适读大智度论释实际品第90卷，18页，得三绝句：

(一)

拔出慳中着布施，布施报尽更沦胥；
由来地狱长期陷，多是世间威福儿。

(二)

受施施者和施物，三事本来俱是空；
除慳烦恼施烦恼，譬若西行却向东。

(三)

布施初入大乘门，毕竟空中若个存？
由此兴悲方便力，众生普渡般若熏。^[34]

路过武汉时，陈铭枢约李任夫、李家友、李伴奎三人同游，席间谈到他被划为右派事，他说“我划为右派，是树大招风”，表示“今后仍当在中共领导之下，尽力而为，以补过报国”。^[35]

陈铭枢身体素来强健，长年坚持冷水浴。1965年5月14日，我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15日作了公开报道，民革为庆祝这次试验成功举行座谈会。陈铭枢对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兴奋，在座谈会上，竟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4时5分逝世。^[36]20日上午，举行了公祭仪式，由何香凝担任主任委员，由蔡廷锴主祭。他的知交熊十力在哀悼他时，评论说：“其一生言动，大概胡胡涂涂。遇事可能冲动，而实无多留恋。与人无少长贵贱，一律以自然待之。无城府、无分别。无道理的后生随便尔汝之，他亦无所觉。其来似有因，其去极自然。吾不能不伤感，而又不必伤感也……漱兄（指梁漱溟……引者）谓其诗，殊不自知，此大误，说得明明白白。”^[37]可谓知人之言。

注释

- [1] 陈铭枢未刊回忆录稿。又参见陈铭枢：《谈自我教育》，《现代佛学》第2卷第4期。
- [2] 陈铭枢：《论国共再合作》，铅印本。
- [3] 《人民日报》1949年8月13日。
- [4]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384-385页。
- [5] 《致陈铭枢（1950年6月19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0页。
- [6] 李任夫：《回忆陈铭枢同志》，《陈铭枢纪念文集》第25页；另据陈铭枢的儿子陈佛仔回忆，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为此曾登门拜访。
- [7][8] 陈铭枢未刊回忆录稿。
- [9]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141页。
- [10][12] 转录自陈铭枢复于振瀛函存稿。
- [11] 陈铭枢：《梁漱溟问题检讨书》残件。
- [13] 陈铭枢自我检讨底稿。
- [14] 陈铭枢致晏勋甫同志暨各委员和全体干部同志函底稿。
- [15] 陈铭枢笔记本谈话底稿。
- [16] 陈铭枢存稿。
- [17] 陈铭枢致萧作霖函底稿。
- [18]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
- [19] 陈铭枢视察笔记。
- [20] 陈铭枢：《视察陕西省、西安市文化工作报告》（油印件）。
- [21] 陈铭枢1956年12月21日致李雪峰函抄存件。
- [22] 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
- [23]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 [24] 陈铭枢：《我的三交》（草稿），节录日记，诗仅录一首。
- [25] 蒋建国：《回忆陈铭枢伯伯》，《陈铭枢纪念文集》第54页。
- [26] 据当时铅印件，此诗是写给在上海的一位教师陈锡襄的。
- [27] 以上均据陈铭枢反省、检讨书底稿。
- [28][29]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57页。
- [30] 陈铭枢：《对过去所犯错误的再认识》（底稿）。
- [31] 陈铭枢：《贞刚三友画册序》（序文底稿）。
- [32] 据未刊底稿。
- [33] 《陈铭枢纪念文集》第184页。建勋为刘建勋，德尊为张德尊，民革中的朋友，时陈铭枢居住在三不老胡同。
- [34] 陈铭枢赴四川视察笔记。
- [35] 李任夫：《回忆陈铭枢同志》，《陈铭枢纪念文集》第26页。
- [36] 据《人民日报》1957年5月20日所刊讣告。
- [37] 熊十力为哀悼陈铭枢致梁漱溟明信片抄件。